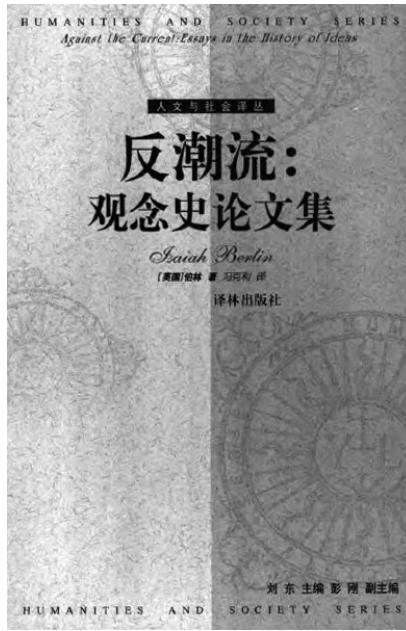


▼三味斋



反对、质询或隐蔽的力量

□陈福民

就思想史变迁以及观念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支配性影响而言，20世纪是特别耐人寻味的时代。这不仅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形成了东西两大阵营依托各自意识形态相互对峙和竞争的冷战格局，还由于以1968年为标志而风起云涌的反体制学生运动暴露出这个铁桶世界的软肋，我们从中可以捕捉到并且解读出来自历史深处各种思想资源的活力乃至魅力。在此意义上，20世纪堪称“观念的世纪”。当然，20世纪很可能还是一个高奏挽歌的时代，它意味着种种兼善全美的、一元论的、单边主义的、声称对世界所有问题具备一劳永逸解决方案的庞大观念终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按照海德格尔的判断，20世纪是一个形而上学终结与思想兴起的世纪。这种“终结与兴起”的思想模式，正是对上述状况的富有预见性的说明。在它身后，有关“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宏大叙事的终结”等等狗尾续貂之论，已经为我们耳熟能详。

然而，海德格尔这个充满睿智光辉的论断，在思想界并没有引起足够认真的对待，反倒催生了大量的更具“形而上学”色彩的讨论。那些连篇累牍的类似经院哲学的逻辑推演层层递

进，其结果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愈发掩盖在繁复绵密的学术语词之下了。20世纪的思想脉络呈现出相当吊诡的情形：一方面，人们或者推崇或者人云亦云地赞颂着海德格尔带给哲学的解放，另一方面，却对海氏关于“形而上学终结与思想兴起”的论断束之高阁置若罔闻，仍然不遗余力地从事着全知型思想体系的构造事业。

也正因此，在20世纪众多大牌思想家的行列中，以赛亚·伯林算不上是特别耀眼特别突出的一个。理由之一，便是他除去年轻时代写作过一本《马克思传》外，再没有成系统和所谓“独创性”的学术专著。与列·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尤尔根·哈贝马斯、雅克·德里达等“明星”级别的结构、解构、后现代人物相比，伯林甚至显得黯淡无光，即便是跟他的英伦同行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相比，伯林似乎也鲜有能够为人称道之处。一直以来，伯林给予这个时代的重要贡献与影响，始终没有得到公正而恰当的评价。所谓的系统性与独创性，成了悬挂在伯林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被提起来挥向他那些机警生动鞭辟入里的思想阐发。然而在事实上，却是伯林那些貌似不够系统不够“独创”的思想史阐发之作，行之有效地践行了海德格尔关于“思想兴起”的预见性论断，并且终其一生都在这条路上孜孜以求有所发现。

以理性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乃至思想信仰的欧洲，曾经坚信这个世界的内部具有某种如“上帝的意志”一般的和谐秩序和终极目的，这个秩序与目的，作为一种绝对真理，是可以通过一整套理性主义规划予以说明和控制的。这种观念在启蒙主义时代登峰造极，几百年来一直是这个世界关于自身的合法性想象。它的后果，是造成一种僵化的线性的理性主义进步观，将不能被纳入到该想象中的别种人类经验统统宣布为低级落后而打入冷宫。上述这一切，遭到了伯林强烈的质疑。这些意见，集中体现在《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一书中。

需要指出的是，伯林的这种质疑和反对来自他所从属的阵营内部。这是很有趣味的事情。作为一个出生在里加的俄裔犹太人，伯林尽管一生都受教并执教于牛津，却与英国的主流思想界并不合拍，或者多

少有些貌合神离。他对兴盛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以及语言哲学毫无兴趣。当然，这也可能是缺乏必要的训练所致。从这时起他开始着手自己的思想史研究。从介入的领域和方向上看，伯林的研究显得缺乏整体感，但又充满活力与问题意识。譬如，他在《俄国思想家》中详尽梳理赫尔岑所关注和用力挖掘的因素，基本上不能进入20世纪欧洲哲学思想的主流视野，但偏偏是《俄国思想家》，达到了欧洲思想家们未能达到的高度，迄今一直是这个领域的权威著作。伯林对20世纪思想传播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自己的方式区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从而为整个20世纪的思想史描述和现实政治理解提供了极其方便的概念武器，以至于人们对伯林作为欧洲自由主义守护人这一角色深信不疑。但从伯林对马基雅维利或者德·迈斯特和乔治·索雷尔等人的研究来看，他显然有足够的理由对历史深处那些隐蔽的观念力量更加兴趣盎然，这些隐蔽的力量包括“反启蒙”、“反革命”、“暴力”、“浪漫主义”、“神权专制”等等。而上述力量，曾因其各种灾难性质早已被宣布了“死刑”，然而，伯林以其惊人敏锐的嗅觉，从历史深处打捞起它们，梳理、辨认这些被忽略、被遮蔽、被污名化的事物的历史，并且重新发现了它们在激烈的历史冲突中所保有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伯林乃是20世纪欧洲哲学主流的一位温文尔雅不动声色的叛逆者。

目前中国大陆几乎出版了伯林所有的著作（除了那本唯一的专著《马克思传》），而在伯林的中文译著中，《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远没有《自由论》或者《俄国思想家》那样著名。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也令人相当诧异。事实上，它是以赛亚·伯林著述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它用功最深，论述周详，蕴含着以赛亚·伯林最为精要核心的思想主张。如果允许我们推举伯林大陆译者“代表作”的话，《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则是当之无愧的首选。

关于《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的书名，顾名思义，反对主要潮流耳，似乎并无深意。但其间隐藏的秘密仍然值得多说几句。毋庸置疑，反潮流需要

勇气，但仅有勇气是不行的，更关键的是需要见识。经历过当代中国革命的锻炼就会知道，“反潮流”在当代中国历史上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伯林以“反潮流”命名这部书，当然并不意味着它代表作者个人的政治道德立场。书中所论人物及其观念倾向，也与伯林相去甚远。最令我感兴趣、也最具有思想魅力的问题是，以赛亚·伯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领域，为什么会对思想史上那些晦暗不明的“异端另类”甚至恶名昭著的人物情有独钟呢？如果考虑到伯林被公认为欧洲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守护人的身份，而他书中所讨论和研究的人物又偏偏程度不同地执有反理性、反启蒙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特性，那么，我们能够从伯林的这种处理方法中获得什么启示呢？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一书所钩沉和讨论的，几乎都是“反潮流”英雄。他们在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或迎难而上独执己见，或潜心著述不与世论苟同。当启蒙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而来时，维柯和孟德斯鸠表达了他们不为时人理解，但事后被证明是一种深刻的担忧；当所有的人都在赞美公民与共和之际，马基雅维利却在为贵族和君主辩护；当法国大革命中崛起的第三等级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后，德·迈斯特却在圣彼得堡为法国的国家制度设计考虑神权专制的合理性……毫无疑问，稍具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上述人事基本都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了。换言之，历史已经向他们出示了红牌。但是伯林以自己精深而有说服力的研究表明，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而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就在于，面对不同价值取向的思想观念，我们总是习惯用抽象静止的方式去判断它们或者绝对正确或者绝对错误，全然无视作为一种真实有效的力量，思想观念是以一种多元论的方式存在并发挥其作用的。

从“潮流”到“反潮流”，以赛亚·伯林选择的这个讨论思路，显然不是即兴发挥，而是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深邃思考和内在的严密逻辑。他所针对的，乃是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现代性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激烈争执与分歧。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越发能够体会和理解，何以哈贝马斯一再强调，迄今为止，现代性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我们固然不应将“反潮流”与伯林自己的政治道德立场等量齐观，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于那些反潮流人物及其知识贡献，伯林在相当程度上倾注了自己的同情理解和深刻认同。潮流之上，现代性价值呼啸推进，但另一面，那些反对、质询和隐蔽的力量始终存在并且富有活力。而人类，将不得不始终面对种种纠结，并在纠结矛盾与历史的吊诡中，变得更加谨慎和谦逊。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以赛亚·伯林著，译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新书品荐

《永远的朝内166号·前辈子魂灵相遇》，王培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王培元在《永远的朝内166号》中讲述了很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前辈们，诸如冯雪峰、聂绀弩、林辰、蒋路、牛汉、舒芜、韦君宜、秦兆阳、严文井、绿原等等，他们对于新中国文学的出版事业，怀着一种赤诚又庄重的眷恋；这册著作还讲述了很多前辈们在那段动荡而荒谬的历史岁月中的磨难与坚守，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历史的撞击与残害，但对于文学出版的热情却从来没有减少过，甚至是更加的热烈了。他笔下的这些文章，感情饱满浓烈，充满着诗意与哲思，但史料也扎实严谨，每位论述到的人物鲜活而不失体贴。他一定费了很大的心血，也一定是将自己的魄力与这些前辈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碰撞的，否则那些前辈的形象是不会那么沧桑，也不会那么沉重，更不会那么令人读后沉思。这部著作，既是1949年以来中国文学出版史的一册别样的记忆注脚，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丰富与坎坷的咏叹和沉思，更是位晚辈学人与前辈们在心灵深处的对话与交流。



《先生之风》，丁东主编，中

▼杂谈

好书的方向

□金星

2010年“年度十大好书”去年11月28日在深圳揭开榜单，依次是《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巨流河》《重新发现社会》《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少年张冲六章》《1984》《苏联的心灵》《朝闻道集》《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和《红轮》。在书籍出版既泥沙俱下又瓦釜雷鸣的今天，识别好书的历程，差不多也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次评选是在经历了一个月的公众海选、“100进50”及“50进30”的复选环节后，最终由全国32位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委会表决而成的。想见既没有书商的策划与鼓噪，也没有盲从和瞎起哄，白纸黑字，该是明摆着的众望所归。看入选书目，觉得政治思想和历史反思类书籍在当下已颇受关注，这是浮躁之后的凝神结思，大可欣慰。而笔者在此更想试着说一下，是如何成就一本好书或曰好书该有的方向。

好书总是因人而异的，喜爱文学的，他们眼中的好书就可能是《诗经》《红楼梦》《复活》《巴黎圣母院》等等，热衷科学的，则或许就是《物种起源》《相对论》《基因革命》等等。凡属好书，启迪心智、拓展知识和陶冶性情这三要素缺一不可，这既是读者的阅读期待，更是对作者的必然要求。作者若没有全身心的投入，没有自出机杼，就难以吸引，更难见感染。福楼拜一写完《包法利夫人》，顿觉满嘴砒霜味；而在杨绛看来，钱锺书在写《围城》时是“痴气”旺盛，作《槐聚诗存》时是“忧生伤生”，当其著《管锥编》和《谈艺录》时则是好学深思。无论是催人泪下的充沛情感，还是启人慧根的吉光片羽，显然都来自作者出众的才情和为苍生立言的那一份热忱。当然，是否好书，时间总是绝对的权威。《傅雷家书》自1981年问世以来，以其独具的思想内涵、哲理意蕴和纯真之情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傅雷家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是因为它超越了一般亲情之间传递消息和问候的局限，它所给予全社会的是“一部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同理，1935元旦下午，鲁迅“译《金表》开手”。那是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一个中篇童话，鲁迅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写道：“新年三天，译了六千字童话，想用不用字，话也比较容易懂，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弄到半夜，睡了还做乱梦……”鲁迅如此煞费苦心，用意很明显，他就是要给他儿子海婴这一代的孩子们，提供一些健康的儿童文学读物，诚所谓“亦尚存希望于将来耳”。这一切都说明着好书的成因与难得，绝非如今那些作坊里的“一蹴而就”。

自由度极高的当今读者已完全不能容忍枯燥的说教式的文字，他们愿意倾听专家学者们发自内心的真实声音，如果作品缺乏思想和哲学的深度，被弃之不顾就是很自然的事。《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作为“十大好书”之首，就颇值得惊喜。该书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参与中国立法的过程，文中的讲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和有原则的合作等特点。中国的知识分子帮助政府走先进和法制的道路，但同时又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知识分子高贵品格的体现。作者江平是著名的法学家，终其一生，为法律呐喊，而且直面历史进程中的伤痛与是非。有参与评选的教授不无赞叹地指出：该书实际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与枯荣，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高尚的心灵。入选的《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其立足点虽是观察社会、批判社会，但作者更强调和注重的是“立”的功力，认为对社会建设的点滴之功应先从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开始，态度是风细雨、不急不躁。“每个社会都有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衍生不同的痛苦。有些阶段，需要火的炽热和烧痛，才能觉醒；有些阶段，需要的却是水的清澈和温柔，才能疗愈一个隐忍不言的伤口。”这是龙应台之所言，显然，“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及其所提供的真知灼见。据悉，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在这次评选中虽入围前30，但在最后的评选中，却以0票落选。有评委给出的理由是：“批评往往很容易，也能引起大众的思考。但如何提出解决的路径却是作品还未能达到的高度。”可谓一语中的，颇值得包括韩寒在内的很多人在著书立说时多加思量的。

▼书评



在近代东北那片悲壮激烈的热土上，细数英雄人物，有一个名字我们不应也不能忽略：齐世英。从热血青年到国民党要员，齐世英一生的风云际会、波诡云谲，从他娓娓道来的《齐世英口述自传》中可读到。

出身农家，却能远赴日本和德国留学，成为东北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父亲为奉军军官，却追随郭松龄倒戈反奉，事败被张作霖通缉；同为东北人中的杰出一员，却与张学良天然隔阂，难以协调；1926年加入国民党，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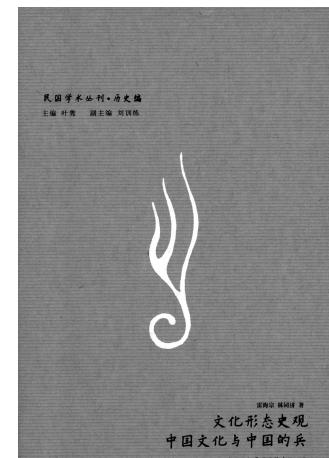
东北铁汉的悲剧人生

□陈宇

持东北国民党党务20年，抗战胜利后却未能得偿宿志，在东北大显身手；正在55岁的壮年，却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党籍；他一向极具抱负，却往往为形势所限，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是矛盾的齐世英，真实的齐世英，正如他的表字“铁生”一样，是一位历尽艰难、宁断不弯的钢铁汉子。

齐世英和张学良，一个是辽宁第一号党证、主持东北党务的国民党要员，一个是子承父业、掌舵东北的少帅，他们都是东北人中的精英，却无法合作，甚至陈立夫意图效仿鲍叔牙居中调和也不得，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东北之不幸。在《口述自传》中，齐世英回忆道，郭松龄起兵之初，张学良因与郭是良师益友的密切关系，曾到秦皇岛欲与郭会见，齐向郭建议“准许他来，何妨将其扣下”，被郭所拒，这个建议若被采纳，或许就没有一月后张、郭二人对峙巨流河，学生打败老师的一幕。也许正是从齐世英这个未被采纳的建议开始，他和张学良之间的隔阂就再也无法化解了。

《齐世英口述自传》中提到的惟一一次齐、张会面，是在汉口。本应“两将罢兵，天下太平”，可惜却是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两人的恩怨从此愈演愈烈，直至西安事变爆发。齐世英自述，事变后，宋子文一看到他就说，“西安事变你有百分之二三十的责任”。张学良在晚年曾批评齐世英说：“这个人



非常史论盼复兴

□史宁

大的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组成。1940年到1941年间，他们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1941年底又在重庆的《大公报》上辟出《战国》副刊，他们在这些报刊上系统介绍了“文化形态史观”，主张“战国时代重演”论，时人称之为“战国策派”。这一文化流派是基于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属于史学革命的一种大胆尝试。当时颇引人关注。而两位先生合作的《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二书则是战国策派名噪一时的著作。

战国策派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宾格勒1917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对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发起了猛烈抨击，以一种全新的体系重新评估世界历史。他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有八种自成一体的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玛雅文化、伊斯兰文化及西欧文化。每一种文化都犹如生命的有机体，必然要经历兴衰盛亡的生命周期。正是由于斯宾格勒此书，才真正建立起了文化形态史观学说。

林同济、雷海宗两位先生对历史文化的论述显然受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影响。其实，无论《文化形态史观》还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严格说来都不是一本专著，而是雷海宗与林同济的主要学术论文的一个汇编集。雷海宗对于中国文化的周期论所论甚详，其畅谈中国文化之两周，着眼点却在于如何建设第三周中国文化。为了创造这“第三周文化”，雷海宗还写了《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中国的元首》

《中国的家庭》等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地解决，建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

由此可见，战国策派的历史与现实是二位一体的，他们用形态史观来研究历史，于是就有“中国的文化二周论”，他们用历史来比较现实，于是就有了“战国时代重演论”。

文化形态说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历史，自有其可取之处，但它往往只抓住历史的一些表面现象进行类比。战国策派将文化形态说视为考古察今的不二法门，对唯物史观根本不屑一顾，他们崇尚欧洲史学观，机械套用西方观点，因此也引来国内主流史学界的猛烈抨击。诚然，客观历史是无限的，任何一种理论，纵然有十分的可取之处，也难免有局限，战国策派却以唯我独是的态度将“文化形态说”视为解决古今中外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就必然导致非科学的结论。尽管战国策派在介绍和应用形态史观方面有种种负作用，但毕竟是他们首先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这种学说。可见，当时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界的情况并不隔膜。能及时将一种西方史学理论介绍给中国史学界，这便是对中国史学界的挑战，也无疑能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战国策派的史学观点尽管另类甚至不被主流学派所接纳，但其终极愿景仍然是期盼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故此，与其他史学流派的观点实属殊途同归。在当年那场旷日持久的史学论证之后的60余年的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这类史学名著，或许会对当下的文化建设别有一番意义在其中。

（《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雷海宗、林同济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10月出版）



《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熊景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1971年，作为知青的熊景明在给男友的信中说她希望将来能够出国去写作，将这个时代的真相记录下来。后来，熊景明真的离开了大陆，2010年春天，她在香港写完了关于自己人生前半段经历的回忆录《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从而完成了将近40年前的那个夙愿，把自己所知道的历史真相娓娓道来。但我读熊景明的这册回忆录，惊讶于她笔下的往事并非想象中的那么黑暗与压抑，而是既有温暖的记忆，也有荒诞的往事；既有欢快的记忆，也有伤心的故事，但她写得真实而客观，笔触是冷静与温柔的。她的目的在于控诉，更不是心怀怨恨的泄愤，而是为了记录下那段历史的客观真相，为了更多的人来了解和研究那段消逝的岁月。